

■女性生命潮汐

智慧的出场

当代人文女学者侧影

谢玉娥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女性生命潮汐

ZHI HUI DE CHU CHANG

智慧的出场

当代人文女学者侧影

谢玉娥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慧的出场：当代人文女学者侧影 / 谢玉娥编. -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649-0856-0

I. ①智… II. ①谢… III. ①女性－知识分子－自传－中国－现代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2174 号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谢 廏 朱海槟

封面设计 翟森森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7

字 数 701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编辑人语

《智慧的出场》能列入“女性生命潮汐”书系顺利出版，除了机缘凑泊，不能不提到为之居中谋划且付出了艰巨劳动的几位学人：

首先是谢玉娥女史，以百倍的坚韧和水滴石穿的努力，获得了学界诸多名家信任，纷纷赐稿，集结成了如此丰盛的大宴，堪供饕餮成瘾的读者尽情品读……

其次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刘思谦教授所形成强大气场，先生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投身于女性文学研究，著述甚丰，且往往出语惊人，令人过目不忘。由她领衔主编的“娜拉言说书系”（学术专著）已初具规模，这次又以她主编的“女性生命潮汐”命名书系，意在彰显女性学人的个性感悟，可谓名至实归。

此外，我社资深编审刘小敏女史的鼎力举荐，居功甚伟。总编辑张云鹏教授慧眼独具，赏识有加，更为本书的出版增添了理解的同情！

60 多位卓然有成的女学者自传，文风迥异，情致盎然，文笔或清新飘逸，或庄重得体，不拘一格，各有千秋，然而对于学风、世风的显现都令人啧啧称羡；更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出一个个真正的女性自我，殊为难得！

端的是：

女性学术视野审视女性写作奥秘
女性感性话语解读女性生命潮汐

序

乐黛云

《智慧的出场——当代人文女学者侧影》是一本丰富多彩、自由随意、真实而极有特色的书。过去,还从未见到过专门呈现这一女性知识群体的思想、生活的实录。

这本书的作者多为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和新世纪第一个 10 年活跃在文史哲教学科研岗位和从事写作的、出版的、卓有成就的知识女性。其内容大部分是漫谈自己的成长过程、人生经历、思想和生活,不拘一格,娓娓道来,诚挚而真实。

这本书呈现了这个特殊群体中个人的不同成长过程,她们的欢乐和痛苦,特别是她们共同遭遇的困难:不论在学习、工作还是求职、评奖等各类活动中,自己的表现都必须优于男性才有可能实现。她们更比男性多一层负担,那就是“对于生孩子的拒绝和渴望”。正如生于 1969 年的李美皆副教授所总结的:“我们这样的女人,为学业,为前途,为成家,为内心莫名的期冀、犹疑和焦灼……忙完了大概就是 32 岁了!……如果现在有一个生孩子的机会,我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去专心致力于一个孩子的诞生,去充分体会身为女人的最基本的同时也是至高无上的创造力。”但“生孩子的必然后果就是:孩子使你发奋想做点什么,但又给你一个什么也做不成的借口!”关于这个任何知识女性都难以逃脱的外在和内心的纠结,再没有比李美皆写得更深入、更细腻的了!

在这 30 年前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多半都与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相关。这本书记载了她们对当时盛行的女性主义的接受、思考,也有怀疑和批判。但无一例外,她们都怀着探索和支持中国妇女解放的热忱,不遗余力地全身心投入为之奋斗。当年中国女性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之一,原郑州大学的李小江教授在女性研究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拓荒工作。最难忘的是她和后继者们为建立第一个中国妇女文化博物馆而付出的艰苦努力。自 1991 年起,李小江就立志筹办一座从未有过的中国妇女文化博物馆,她和伙伴们东奔西走,费钱、费时、费力,终于搜集了 400 余件妇女人类学藏品,包括极其珍贵的已经绝迹的湖南女书,记载着民族迁徙历史的

苗族刺绣,等等,但她们却因无权、无钱、无力而无法在河南正式展出。几经磨难,从孕育到诞生整整用了11年,这个极有特色、极有价值的妇女文化博物馆才终于在陕西师范大学正式建立!其复杂曲折的斗争经过和情感历程详尽记载在本书屈雅君的《今生一件事》中,足见开展妇女研究工作困难之一斑。

本书作者多是学有所成的老中青三代知识女性,在她们真诚的自述中往往闪耀着探索和智慧的光辉,给读者以难得的启发。举例来说,我读刘俐俐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选择及其困境》就觉收获良多。她提出人的“沙粒化”和公共空间的问题,她认为文学的公共空间正在消失,她问道:“我们的文学研究的结果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还能够进入吗?能对现实人生有多少帮助呢?……一方面承认文学公共空间业已消失是很让人文知识分子痛苦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仍然从事的学术研究又宿命般地与对人的关怀,对公共空间相联系。”这触及了每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问题,用刘俐俐的话来说,这种“心里非常清晰中的无奈”不是也经常叩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吗?另外如徐虹提出的一些男性批评家以捍卫中国文化的面貌出现,认为中国道家崇尚阴柔之美,中国伦理确认母亲的地位,“天人合一”的“第一自然秩序”就是阳为先为主,阴为次为辅等,他们坚持这一切都证明“女性问题”在中国根本是一个“伪问题”,不值一顾!这类说法虽然荒唐,却仍颇有市场,根深蒂固、貌似有理,值得深思。

总之,这本书不仅生动地记下了30年来知识女性艰难跋涉的鲜明足迹,而且由于这是一本自述之书,作者往往直抒襟怀,全无掩饰,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剖析思想、总结自我的直白的精彩片段。值得一读。特向大家推荐。

2011年6月29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重申抗拒失语(代前言)

刘思谦

玉娥让我为她编的《智慧的出场》一书写一篇学术感言,一直拖延着未能动笔——倒不是抽不出时间,而是在酷热难耐的炎炎夏日里整个身子都懒洋洋地不想动。一日午饭后躺在床上翻阅那本厚厚的由我主编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集,里面有我写的我在1998年5月14日清晨突然不会说话了——得了叫做“命名性失语”的脑梗塞的事,题目叫《抗拒失语》。这个题目一下子又把我给抓住了,就像当年我听到医生说出“命名性失语”这个病名时感到一阵战栗一样,“知道这是一个神秘的隐喻,是需要我用有生之年去抗拒的宿命,是知性神明对我的一种提醒,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鼓励我要鼓起勇气去抗拒失语”。如果用“抗拒失语”这个题目,是足以概括我在女性文学研究中所获得的学术感想的。因为无论是五四运动以来至今的一代又一代女作家还是我自己已有20余年的女性文学研究经历,难道不都是敢于抗拒失语的结果吗?正是为了抗拒失语拒绝被命名被言说的命运而拿起笔来自己为自己命名自己言说自己,才有了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的现代女性文学这样的女性的文学新景观,才有了女人自己的文学,而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说到底难道不也是敢于抗拒失语自己为自己也为女人争取自我命名的权利的一种勇气和智慧的体现吗?我意识到如今要写的这篇学术感言,就是要回顾和总结女作家们和我自己在抗拒失语自我命名道路上的经验与感受,以便把这条艰难而又充满了乐趣的道路走下去。想到这里我决定就用“抗拒失语”这个题目再写一篇,并且带有一点庄严感地在前面加上了“重申”这两个字。是“重申”而不是一般的“再谈”,以表明“抗拒失语”之于我的女性文学研究学术思路形成的起源性的紧密关联。

和许多同性同行们一样,我的女性文学研究之路,也是从追问“女人究竟是什么”这个至今也还没有明确答案的难题开始的。她们否定了千百年来男人对自己的命名,诸如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是男人许多件衣服中的一件等等命名,而力图说出自己是什么,却总是不能正面说出而只能说出不是什么。就是如今已成为中国许许多多渴望自由独立而出走的女性文

学原型的娜拉，当年当她离开那个甜言蜜语的丈夫时，也只能说出她不是他的玩偶而说不出她是什么。这是女性争取自身解放道路上的一道自我命名的思维的也是生存论上的难题。我将1993年春完成的第一部女性文学研究专著《“娜拉”言说》交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对这个问题似乎若有所悟可仍然说不出。这种恍恍然而又似有所悟的心态，体现在《“娜拉”言说》首页我的照片下面的自题词，便是这样几句话：

研究女性文学，顿悟于一句大实话：女人也是人。

然而，这作为人的女人又是什么呢？我仍然说不出。也许就是我、就是你、就是她，就是这里写到的一个一个的女人。

这几句话的写出，就体现了这种有点明白而又不怎么明白的心态。“女人也是人”——这个关于“女人是什么”的正面的回答之能够写出，是鉴于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性认知，而正是有了“人的发现与女性的发现”这一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才有可能出现这样一批觉悟到“女人也是人”和自己“作为女人也是和男人一样的人”的现代知识女性对自我的认知。“女人也是人”可以说是现代女性觉醒的起点，也是她们对父权夫权对自己命名的反命名和自己为自己命名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起点。然而这个起点至今看来也仍然是暧昧不明的。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女作家们以及女性文学研究者们并没有在这个起点上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即这个“作为人的女人又是什么呢”给出明确的答案。我也没有。所以我只能如实回答“我仍然说不出”。不过紧接着“也许”后面的一句肯定判断句式“也许就是我、就是你、就是她，就是这里写到的一个一个女人”，今天读来却感觉到一些“朦胧的理性思维的闪光”。也许正是以这个朦朦胧胧的理性思维的闪光为起点，在我持续地锲而不舍地阅读思考中，“个人”这个概念脱颖而出，对于正面回答“女人是什么，我是什么”这个追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方法论意义。“个人”在我的思维中渐渐浮出水面，是因为我在多年来的阅读思考中感觉到这些同为女人和同为现代女作家的女人们相互之间是如此不一样（这“不一样”不言而喻自然也并不能否定她们之间还有共同点）。例如即使是同样出身名门且有国外留学或生活经历并在个人爱情婚姻方面比较完满顺利的冰心、凌叔华、林徽因、杨绛之间，以及在出身中等阶层家庭又都在20世纪30~40年代走向了左翼革命文学在爱情婚姻方面不够顺利的白薇和丁玲之间，彼此之间也是如此的不一样。仿佛是波伏娃说过一句这样意思的话：在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之间的差别，常常大于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之间的差别。这是一种来自生活的直觉感悟，却并非理论思维的准确概括。怎么办？该怎样概括出这同为人的男人与女人之间和同为男人之间与

同为女人之间的同和不同呢？这是女性文学研究所遇到的一个难以回避又如此难解的难题。在这个难题面前，我感觉国外的无论是早期女权主义运动抑或后来的“社会性别研究”，对“性别”这一人的一种性别分类概念，在方法论上总是有些一概而论，即过于看重其共同性而忽略了其共同性中不同的个人性了。也许正是这样一点恍恍然的感觉，使我写出了上面这句话即“作为人的女人”“就是我、就是你、就是她，就是这里写到的一个一个女人”这句话，并且在《“娜拉”言说》的写作体例上，选择了注重个性的作家论体例而拒绝了一概而论的常常是理论概念先行的所谓“综合研究”体例。

“个人”由此而成为我的女性文学研究关键词。因为终于抓住这个关键词为起点，我思考了如何把这“个人”与“作为人”与“作为女人”三者统一起来。因为仅凭常识也能相信，每一个具体的女人，都既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女人”，同时还是一个名字叫做某某某的人。这“某某某”也就是指称一个具体的不会和别的任何一个女人或男人相混淆也不会或不应该被别人所代替的人。这在学界叫做“专名”，也可称为是这个具体的个人的语言学“能指”。这样，我就可以从“人”这一宇宙上被称之为“万物之灵长”的物种上来梳理“性别之与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了。原来，“性别”是“人”这一物种的一种分类标准，即“人”按照其性别可分为“男人”和“女人”两种，就像“人”是按照其与别的物种牛、马、羊、鸡、狗等而加以区分的一个物种一样，都是一个“类概念”，指称的是抽象的在某一类别中的共同点，而类概念所区分的各种不同类别，如“人”、“男人”、“女人”、“民族”、“阶级”、“国别”等概念自然也是抽象的。准确地说是千千万万个具体的人，即具体的男女人的共同点抽象出来概括地称之为“人”、“男人”、“女人”，等等，也就是语言学上所说的“抽象能指”。我们在生活中，只能看到一个一个的不是男人就是女人的具体的而且是有名有姓的人即“个人”，却看不到不男亦不女没名又没姓的抽象的“人”和抽象的“男人”、“女人”乃至“民族”、“阶级”、“国家”，等等。至此，我想我已经能够给“个人”这个概念下定义了：即“个人”是“人”这一物种和“男与女”这两种性别等各种分类标准所指称的可视可感的实实在在的一个“实体”，也是在分类学上不可再化约不可被替代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男人”和“女人”等等最后的“能指”。可是到此为止，我还只是从人的分类学上说清了“人”、“男人或女人”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触及这三者之中共同的价值论上的问题，而我在前面所说的那个作为女人觉醒的起点的“女人也是人”的“人”，却是具有沉甸甸的价值论分量的。这里的“价值”，也就是以上“人的觉醒、女性的觉醒、个人(个性)的觉醒”为起点的启蒙精神所追求的，以平等、自由、自主、独立、尊严、人权等为价值目标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如果抽掉这些人之为人的普世价值观，仅从分类学上回答“人是什么和女人

“是什么我是什么”的追问，便必然会陷入纯生物学的泥潭，而无助于被贬为“第二性”的女人女性意识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更不能启发女人摆脱依附性乃至奴性的没有人的尊严的“第二性”而去追求建构自己的主体性人格获得自己言说自己的话语权利和能力，甚至有可能把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引到脱离人的尊严和独立的歧路上去的危险。试问当年我所顿悟到的“抗拒失语”，难道不是抗拒这些以种种形式剥夺压抑女人作为人作为个人的话语的权利的自觉意识吗？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我在那篇写于 90 年代初的《抗拒失语》中，以几个肯定性判断“就是……”“就是……”阐释了什么是“抗拒失语”：

抗拒失语就是敢于倾听和应答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就是让自己的感觉、经验、思想进入语言，就是宁可不说宁可沉默也不说那些虚假的不知所云的“他者语言”，就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被膨胀的权力话语、商业广告话语所蛊惑和劫持，就是用语言之光朗照自己内心的蒙昧和黑暗，就是从罩在我们头顶的那张失语的大网中突围而出。①

这至今也仍然是我给自己拟定的女性文学研究座右铭。

文学是人学，女性文学不言而喻当然也是人学。作为具体的女性文学研究的人学研究，如何才能够抗拒失语，不被权力话语、商业广告话语乃至男权话语蛊惑与劫持而发出真实的自己的声音呢，这需要建立一种结合人学相关理论与人的价值论的女性文学学术研究理路，它体现在我在以上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包含了三段论逻辑推理的关于人——女人——个人的概括，也是我对五四以来现代女性关于“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和我是谁”这一追问的回答：

人（与男人一样的人）——女人（与男人不一样的人）——个人（以独立的提升了的具体的千差万别的个人，将“做人”与“做女人”统一起来的人）。

这是一个标准的“正、反、合”三段论逻辑推理过程，也是一个超越了人和性别分类学概念的现代女性关于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和我是谁的追问的具体的又是内涵了人的价值论的理性回答。同时这也表明我的女性文学研究理路，已经从学理层面上纳入了代表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告别了中世纪

① 见《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第 48 页，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9 月版。

的蒙昧与封建黑暗的启蒙的理性的现代文明价值观与价值理念。这也就是说,我国第一代现代女作家庐隐、石评梅们关于“人和女人和我”究竟是什么的百思而不得其解的形而上的“哲学论”,经过以上“否定之否定的肯定”,终于得出了“个人”这个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合题”,落实到了非常具体而现实的同时又是理想的每一个“个人”的现实生存的地面上,同时也提升到了我(你、她)作为个人如何才能告别封建的人身依附性而达到独立自主,自己实现自己作为人和作为女人的生命价值,从而自己回答“我是谁”这样一个作为人的理想的也是现实生存的难题。从女性文学研究方法论而言,那便是以个人的名义将做人与做女人统一起来,冲出千百年来女性生存的话语黑洞,冲出失语的“无物之阵”,自己回答我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女人这个难题。而这,其实也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是自己对自己摆脱了奴性、依附性的女性主体性建构。不言而喻,回答这个难题对每一个女人而言,都是一个艰难的渐次实现的过程,也是对每一个作为“个人”的女人思想的和生存智慧的考验,同时也是我个人“抗拒失语”的理性目标。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的“人”具体到“个人”应该说是各种社会关系与性别关系的综合体现,而性别关系尤其是进入爱情婚姻的两性关系又是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最复杂最难破解和最难说清楚的关系,这自然也是我为自己设定的“抗拒失语”的一个难题。《“娜拉”言说》所写到的十二位女作家,几乎个个都遇到了这方面的各不相同的难题,而她们如何处理、解决这个难题,又没有或许永远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我在写作《“娜拉”言说》的过程中,发现这又是她们各自在“言说”中语义、语调最为暧昧和滞涩的部分,常常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或者词不达意。例如白薇这个当时知名的左翼女作家,一生受够了父权夫权双重压迫之苦,她从娘家婆家这两道家门出逃之后到日本留学,并开始写作。父亲给她们姐妹二人起的名字叫黄影黄显,寄予了彰显家门的希望,而她的反命名是改名为“白薇”,并且特别申明“白”是枉然之意,“薇”不是“蔷薇”的“薇”而是“山窝里一种味极苦的苦薇草”,意思是自己在两性关系方面所受的苦是一种说不清楚的苦。她还说过:“女性是没有真相的。”“什么真相、假相,假到牺牲了女子一切的各色的相,各由社会、环境、男人、奖誉、毁谤或谣传去决定他们。”^①白薇以自己在父权制社会的生存体验说出了“女性无真相”这一现实处境,然而却没有说明白女性何以没有真相,更说不出她认为女性的真相是什么。这时她已经历了离家出走后和风流诗人杨骚的苦恋,杨骚接二连三的移情别恋和反反复复地来了走走了又来,并且把他严重的性病传染给了她。两性关系的爱情婚姻对她而言,她之所以能够说清楚的便只是一个

① 转引自拙著《“娜拉”言说》,第21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

“苦”字，而且是徒然枉然的说不出和说不清楚的苦。她的“女性无真相”，和渴望自由独立的“娜拉”们说不出“女人是什么和我是什么”的自我命名的困惑犹疑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失语的痛苦”。还有萧红这位被鲁迅器重的文学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也在两性关系方面经历坎坷，使她感觉到自己一身而分裂为两个“我”，一个是向着文学的天空飞翔的“我”，一个是向下坠落随时都会掉下来的两性关系中的“我”。这种壮丽的飞翔和失败的坠落的自我感觉，也正是作为向着自由独立的精神世界飞翔的“我”和现实的两性关系中痛苦的“我”的分裂。尤其是她与同样知名的现代作家萧军的关系，至今也还是一个难以破解的两性关系之谜。按说，两萧的传奇性相逢与结合，可以演绎出一段现代的“天作之合”的两性关系佳话。萧军从根本上说也是一个好人，与萧红在政治上与文学上可谓志同道合。后来他与萧红分手后到了延安，以及 1949 年后在东北解放区历次政治整风中都是一个绝不随波逐流的硬汉子。可是据现有资料看，他和萧红的关系却是自从他们走到一起就没有过过多少平静的日子，如从 1937 年夏到 1939 年春总共十个来月的时间，萧红竟只身三次出走又都悄然而归。也就是说她不到一年时间就做了三次“娜拉”，而三次却又都不得不“回来”。从萧红的一首短诗《苦杯》可以看出，萧军的移情别恋是一个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或者说，他为什么要移情别恋呢？进入爱情婚姻生活的两性关系是人类各种人际关系中最复杂也最难处理的关系。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关系在空间上的近距离和时间上的长久性。这是具体的作为个体的男人和女人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所结成的生存共同体。可为什么是和“这个”男人／女人而不是“那个”男人／女人，以及这每一对生存共同体该如何生存如何活着，又取决于各种不同的主观条件，也取决于每一对男／女主人公各自的生存能力与智慧。本书标题《智慧的出场》，恰恰寄托了编者谢玉娥对各位女学人们生存智慧的赞许与期望。

“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张爱玲这个旷世才女把《诗经》里这句话作为她所向往的两性关系的理想境界，可是她自己的两次婚姻尤其是和胡兰成的婚姻，却让她感到酸甜苦辣五味杂陈，说不出也不想说，失语整整三十年才在她的最后一部半自传式小说《小团圆》中以化名的方式吞吞吐吐地说了出来。还有她后来在美国麦克道尔文艺营实乃救济营里与一个大她 29 岁的美国老男人赖雅的婚姻，本想借此解决自己的饭票问题，却不想反倒成了他的“饭票”兼护理员与“保姆”。这说明女人的问题如果说是一个性别问题，而这个性别问题本身和民族的、社会的、经济的乃至权力的各种问题联系起来时，又是千差万别的和十分具体和复杂的。如何处理好如此具体的两性关系，是没有统一答案和公式的。只有靠普天下的每一个进入这样的两性关系的女人和男人们运用自己的记忆和智慧，好自为之了。

在写于 1993 年的《“娜拉”言说·引言》中,作为理解女性文学之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大背景,我简略回顾了两性关系由母系制到父权制转变的契机和脉络,认识到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各种关系中最先发生变化的关系。如今十九多个年头过去了,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它也将是人类社会发展各种关系中最后才能发生根本变化和得到根本解决的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在同一个屋檐下和一扇扇紧闭的家门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对夫妻正在进行着冷战热战合合分分笑笑哭哭的家庭悲喜剧乃至闹剧。两性关系之复杂性与根本变革的艰难性,决定了我的女性文学研究“抗拒失语”的长期性和艰难度。联想到近十年来女性文学的悄然沉寂和女性文学研究的严重失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两性关系方面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使我们莫衷一是难以言说。难道我们又一次被那张失语的大网罩住了吗?例如电视连续剧《蜗居》里的女大学毕业生郭海藻的宁做“二奶”的婚姻观和她对“有权有钱也有情有型”的贪官宋思明的钟情和对爱侣小贝的背弃,联想到现实生活中一些同样是知识女性、职业女性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和“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我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的择偶观,与《伤逝》子君的时代相比,我们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呢?我说不出。我所能做的,大约也只是一如既往地“抗拒失语”,并以这“抗拒失语”来建构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作为人”与“作为女人”的“个人”的主体性价值观。

当代现实生活中两性关系方面所出现的问题所反映出来的女人或男人方面价值观的变化,实在是太多了。可是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失语的。我们好像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能力!本文完稿后,仅从随手拈来的《大河·文摘报》(2010.8.4)上头版头条一幅有说明文字的照片,就反映出当前两性关系的新问题。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赤背负荆条跪在一座大桥桥头向妻子负荆请罪。说明文字如下:

“背上的荆条和膝下的洗衣板让湖南籍小伙子余海放弃了一个男人最后的尊严底线。15 天以前,因为一次口角,余海的老婆离家出走。苦寻妻子无果的他 7 月 26 日下午终于选择跪在了熙熙攘攘的闹市天桥上。”余海每月收入 8000 元,但仍买不起房,他说,已经陪伴他走过 8 个年头的妻子气头上的一句“无车无房”挫伤了他的自尊。他那一巴掌下去的代价,“是爱妻的出走,出租屋内只留下出生刚刚 10 个月的儿子和他自己”。

这又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娜拉”!一个只为了她那一句“无车无房”而引来的丈夫的一个嘴巴的“娜拉”。她走到了哪里?是去寻找一个《蜗居》

里“有车有房”的宋思明那样的男人,还是决定自己谋生谋车谋房?她难道忘记了家里还有一个才10个月的嗷嗷待哺的小儿子?到8月4日为止,她已经出走15天了。但愿她能念及孩子和已经知错认错的丈夫,还是“回来”吧!……这个两性家庭情感短剧,内涵着有待破解的当代两性关系丰富而又复杂的性别的也是社会的两性生存难题,可是我们面对这样形形色色的难题却失语了。……就在这同一期的《文汇报》上,就有包括这一头条的四个有关两性关系的消息,其他三个仅看看标题就可以了:“富豪遗孀遭‘情人’勒索”、“雇主与保姆偷情后遭勒索”、“不过是‘嫖嫖而已’”。还有一条虽然不直接涉及两性关系,却与两性有关:“酒后车内放黄片 驾车连续追尾”……这些个女人和男人,究竟都是怎么了???

本文原为由谢玉娥编、河南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智慧的出场——当代人文女学者侧影》一书所写的一篇个人的学术感言。按玉娥的意见,作为这本书的前言;而我的“学术感言”,则由另一篇较长的关于我的文学研究之路的回忆与思考来代替了。这大约是由于玉娥认为“抗拒失语”这个题目,大体上可以概括众多活跃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女学者们学术之路上的侧影吧?

作为本“前言”的作者,仅在此祝福各位学姐学妹们健康快乐,并遥祝已经离开我们的李子云学姐在天之灵安息!

2010年9月12日初稿

2012年11月8日改定

目 录

序	乐黛云(1)
重申抗拒失语(代前言)	刘思谦(1)
叶嘉莹：我的诗词之路	(1)
李子云六月的云	
——李子云老师侧影	陈惠芬(23)
郑必俊：结缘·求索·开拓	(28)
乐黛云：我的比较文学之路	(35)
苏者聪：独立思考 力求拓新	(60)
孙小礼：文理交融的学术路	(69)
朱 虹：我的本色的“女性主义”	(78)
刘思谦：作为“人学”的文学研究之学理与激情	
——关于我的文学研究之路的回顾与思考	(84)
饶芃子：我的学术之“缘”与“路”	(101)
刘志琴：不拘一格求真知	(114)
陶 洁：往事杂忆	(121)
汤淑敏：春蚕到死丝方尽	(131)
陈美兰：为追求学理性而执著前行	
——在当代文学研究路上	(139)
陈祖美：“别是一般滋味”的学术之路	(151)
盛 英：迟开的花儿：请别先凋谢	(161)
郎 樱：从书斋走向田野	(173)
杜芳琴：寻梦、探索与践行	
——27 年妇女与性别研究反思	(179)
吕美颐：春华秋实	
——我与中国女性史研究	(190)

任一鸣：生命价值与心灵温暖

——我的女性文学探索之路 (200)

金燕玉：寻求美好 (215)

赵园：被光明俊伟的人物吸引，是美好的事

——答《书城》李庆西问 (223)

胡辛：蔷薇雨中的回眸 (234)

王春荣：我选择 我存在 (242)

钱满素：半路出家 (249)

杜小真：我的未名湖梦

——一个“非正宗”北大人的回忆 (253)

金一虹：我的性别研究路 (259)

高世瑜：打开一扇窗子 (265)

黄梅：奥斯丁“遇见”《教育诗》 (272)

邓小南：求学·治学·教学：感想点滴 (278)

黄嫣梨：几番风雨几番歌 (285)

王政：“逆水行舟”的10年历程 (293)

裔昭印：我的学习和研究之路 (302)

夏晓虹：随境自在展风华

——夏晓虹教授专访 (313)

刘俐俐：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选择及其困境 (325)

屈雅君：今生一件事 (333)

胡亚敏：借鉴·整合·创造：西方文学批评的中国化道路

——胡亚敏教授访谈 (346)

陈惠芬：重建和现实的关系 (356)

钱虹：我的来世今生 (359)

陈顺馨：学术是打通界线的和平工作 (365)

季红真：开拓心灵的疆域 (372)

孙歌：个体文化认同的精神性格 (380)

赵树勤：在倾听中成长 (390)

樊洛平：结缘台湾文学 钟情女性世界 (394)

崔卫平：经验的年代 (401)

陆卓宁：“以文学的名义”？ (411)

王红旗：为女性造梦、立言

——从事中国女性文学/化研究琐忆 (417)

肖巍：生在一个男人大都还是“青蛙”的年代

——我为什么从事女性主义研究/女性与哲学 (425)

畅引婷：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我的妇女研究历程和感悟	(436)
徐 虹：我与“女性主义”	(443)
李长莉：习史明智 学问人生	(451)
林丹娅：读读写写：我之林中路	(459)
戴锦华：随感两则	(468)
陈瑞琳：我的“草原”	(478)
段江丽：岁月留痕	
——那些与学术有关或无关的人和事	(483)
刘咏聪：前半生学记	(496)
陈晓兰：从性别研究到城市研究	
——我的成长之路	(507)
万莲娇：在文化审美的星空和大地练习做一个公民	(513)
郭 力：人生百年 何以自我	(519)
荒 林：读书、生活及女权	(522)
罗 婷：从文学研究走向女性教育	(528)
李 玲：生活在白纸黑字中	(536)
王 宇：记忆与冥想	(545)
杨莉馨：风景愈来愈美丽	(550)
李美皆：但是，就这样罢	(557)
董丽敏：从“女性文学”到“性别政治”	
——一种回顾或展望	(563)
后记：追寻她们的足迹 谢玉娥(569)